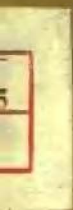


胡 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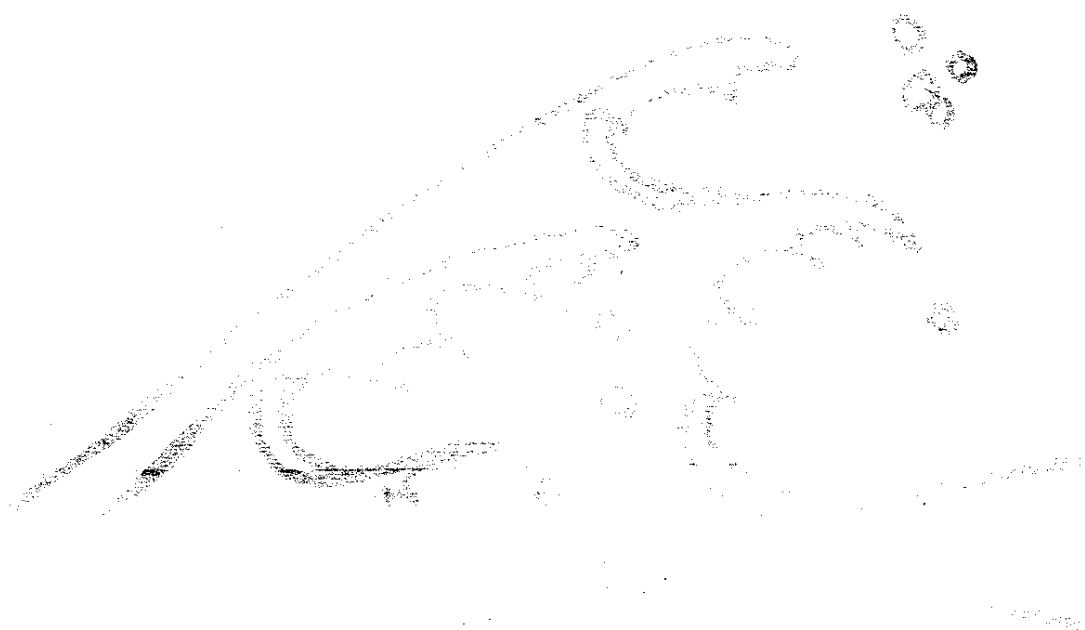
两重奏

王季平



两重奏

胡 考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以五十年代镇反、三反、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为背景，描写了当时某工业管理局内部各种人物——各级领导，保卫干事、老知识分子、一般干部和家属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作风上的种种表现。

两 重 奏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23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895 定价 0.79 元

第 一 章

局里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。此人生得肥头大耳，眉粗眼细，身不高而腰略壮，体不矮而四肢独短；论衣着则朴素大方；论举止、态度则安详自若，好象极有分寸。

液体燃料工业管理局是个新成立的机关，机构还不健全，人员还没有配齐。这样一个机关要增调些干部进来，原是常事。何以这样一个貌不出众，语不惊人的人物，倒引起别人注目呢？须知世间事往往不能有固定的看法。有些人哗众取宠，危言耸听，固然惹人注意；可是有些人语无虚发，言必有据，有时也容易令人重视，这是一。其次，一个人物还可能因为时间、地点、机缘的不同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。为此我们必须先从这个人物的出场谈起。

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一九五一年的二月间开始的。到了六月，这一运动迹近尾声。液体燃料工业管理局算是展开得较迟的一个单位，到了七月也大体完成了任务，凡是该交代的人都交代了问题；凡是该写自传的人都写了，或者正在写中。看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，总是领导上一再交代政策，讲明道理，要大家忠诚老实，放下包袱，以便今后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。只因这个管理局，党、团员不多，大部分是留用人员；一部分是聘请来的工程技术人员；一部分是社会上招

考来的事务人员，可以说，干部的政治情况极为复杂。因此，领导上决定，再进行一次动员，召开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。

那一天，俱乐部重新作了布置，四面墙上增贴了许多标语，使会场显得分外庄严。下午两点钟，开会的人都已到齐，会议只等副局长吴克勤到来就能举行。可是两点过半，偏是吴克勤迟迟不见到达。其实吴克勤就住在北屋，脖子长的人隔窗可以望见他那魁梧的身材，他在跟部里的办公厅副主任，也就是党委书记邓仲融谈话。估计谈的定是与镇反有关的问题，却是吴克勤挺着肚子，谈笑自若，他全不顾及这里有二百多号人等他开会。

秘书长罗纯良是大会主席，他等得心焦，曾派人去催请了两次，总算吴克勤带着邓仲融来了。他们进入会场，填补了主席台上的空座。

这次镇反运动的领导机构是按行政职位编制的。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，其中唯一的例外是人事科副科长陈德人。每次大会，这些人仿佛是当然主席团，却是每次总有些人不愿意坐到主席台上去，必得三邀四请方能归座。

会议开始，罗纯良宣布大会的意义，不知怎的，他今天气色不佳，说话带着伤感的调子；而且话也说得不多，只一刻钟工夫就结束了。接着是吴克勤讲话，他的话讲得很漂亮，富有煽动性，但有些用语不够严肃。今天与往时不同的，就是最后有邓仲融代表部的领导讲几句话。

自从镇反运动以来，人事科有个保卫干事叫做李学武的，是个最积极、最忙碌的人。本来，积极肯干总是好的，可是这到了在李学武的身上，有时就不免发生急躁情绪。比如，

有一次他跟局里的一个干部谈话，他的原意是要对方好，希望对方把问题交代出来。只因对方摇了几次头，李学武勃然大怒，他竟然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话。这件事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意见，吴克勤曾经想撤换他的工作，终因为这样的事毕竟是个态度问题，对李学武来说，想把事情办好，也是事实，再加秘书长罗纯良不同意吴克勤的意见，这件事经过批评、检讨也就过去了。

李学武冷静了三天，渐渐的他那股冲劲儿又来了，逢到开大会，他总是满场飞。比如，到主席台上端茶水、敬香烟，这是他的事；台下前面两排座位空着，李学武站在台上喊口令，要全体起立，向前两步走，坐下，以便让后面站着的人也有座位，这是他份内的事，因为他从来都是大会的司仪；可是墙上的标语掀开一角，也是他着人找浆糊补上；会场的布置也经常由他提出意见来。诸如此类的事一并拉在自己的头上，当然，他就不能不是一个最忙碌的人了。

今天，正如上述，李学武又忙碌了一番。还在吴克勤尚未到会以前，李学武一眼看见那人坐在人堆里，此人到局工作才几天，也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。他坐在那里并未引起旁人注意。李学武先在台上叫道：

“老孙，上这里来，来！”

老孙尽力摇头，表示不可。岂知老孙不推委还则罢了，一经推委，李学武索性双手捂嘴，叫嚷起来：

“啧，老孙哪，这有什么客气的，上来，你应该坐到上面来，扭扭捏捏干么！”

好在会议尚未开始，满屋子的人，本可以说说笑笑，或唱

歌，或拍手，只因这是镇反运动的会议，分外严肃，大家都默不作声。如今看见李学武在那里高声说话，又带许多动作表情，先是全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李学武身上，又见台下坐着一个陌生人在跟李学武做手势，注意力就转到了老孙身上。

这时老孙显得惶恐不安，偏是老孙愈觉不安，看的人愈多；李学武也愈加得劲，他索性从台上走下来，跟老孙拉扯起来。一时象街道上发生了纠纷，许多人都站起来看，甚至有人发笑。总算老孙咬着李学武的耳朵说了半天话，李学武还在执拗，最后是老孙几乎翻脸，李学武这才只得罢了。

可是，就因为有一个场面，会后就有好几个人问起李学武，刚才那人是谁？

李学武用得意的口吻，一手遮着嘴巴，对那些人说道：

“这人你不知道？他是咱们的头头儿——人事科长。他姓孙，——孙是子丝孙，鸣就是一鸣惊人的鸣，和是和平的和。他是个老资格，他当过营的教导员，本来要提升为团政治委员的，后来他负了重伤就复员了。——他来了好几天了，你没有见过？——这人挺好，有能耐，他跟我一样，都是部队里下来的。部队里下来的人，就有部队里那套作风，什么事说干就干，雷厉风行——干脆！”

就因为有一个场面，因此孙鸣和这个人物，刚一出场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石碑胡同有一个小四合院，房屋较好，是局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宿舍，这个宿舍离办公室也比较近。吴克勤是副局长，因为局里没有正局长，副局长就是最高领导人。吴克勤

无须推托就占用了北屋五间房。这五间房可以说是全局最好的宿舍。基本建设处处长王仲廉和勘探处处长张建住东西两厢，各三间房。南屋一连五间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俱乐部。这个俱乐部平时很少有人来俱乐，只有开大会，做报告，或是星期六晚上举行晚会才热闹一阵。张建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，他称这个俱乐部为“红白厅”，意思是除了开会，还要办理红白喜事。的确，过春节的时候有两对男女在这里举办过婚事。

秘书长罗纯良住前院两厢共六间房。所谓前院，其实与后院并无间隔，只是中间有一排空落落的俱乐部，从感觉上来说似乎有个前后之分，因而人们称之为前后院。罗纯良家口独多，三个孩子是一、三、五岁，逢到星期六、日，十岁的男孩子小良和八岁的女孩子小芳，从干部子弟学校回来，那就更热闹了。罗纯良坚持要住在前院，也是因为自己孩子多怕吵闹别人的意思。虽然，前院的房屋较后院的要差得多。

如此说来，这个四合院里一共住了四家，其中大部都有老婆孩子，从而就有保姆。罗纯良有丈母，张建有小姨子，门房里有看门的和汽车司机，总共倒也有三十来人。

现在且不表别人，单从秘书长罗纯良说起。罗纯良这几年来一直自认为不得志。凡是自认不得志的人物，通常有个毛病就是喜欢与人比较，而且总是在一点一滴上，拿自己的长处跟人家的短处作比较。比如，罗纯良是一九三五年入党的，吴克勤是一九三七年入党的，以党龄来说他比吴克勤长两年，这是一种比较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吴克勤不过是一个县委书记，罗纯良已经是地委组织部长，从那时的名义来说，他比吴克勤

高些。现在吴克勤是副局长，独当一面，他自己只是一个秘书长，又有屈居人下的想法。何况秘书长这类职务，在他看来无非是管理家务，打打杂的交易，所谓“小事办不完，大事办不了”，忙得满头大汗，功劳簿上开的是吴克勤的户名，这又是一种比较。当然，可比较的东西还很多。比如，在他看来，吴克勤骄傲自满，大而化之，浮而不实；他自己则勤勤恳恳，埋头苦干，朴朴实实。

张建不仅爱说俏皮话，言语之间还喜欢带些牢骚。比如，这几句话是他常说的：

“咱们是万金油干部，什么病都能治，什么病都治不好，头痛抹头，脚痛抹脚。今后不再是游击战争的环境，今后是建设社会主义。当干部要当个奎宁干部，谁有疟疾，吃下去就能见效。”

这类话，罗纯良听来最合心意，只是从表面来看他并不欣赏这类话。

罗纯良是个说话不多的人，他什么事都填在心里，有牢骚，决不发泄，就连他老婆张桂芳也不知道罗纯良心里有什么疙瘩。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，也从未推卸过什么责任，总是日以继夜积极地干来。他自己有个信条，认为：“埋头苦干，总是好的。只有埋头苦干才能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。”

可是，最近一个时期，一件一件不愉快的事都堆在他的头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几乎影响工作。

这些事说来话长，需要慢慢的道来。现在且说头一件。近来他老婆张桂芳几乎一有空就跟他吵架，有时连哭带闹的，影响到后院的人。原因是，罗纯良年轻的时候，在家乡结过一

次婚。这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旧式亲事。罗纯良进入根据地以后，填过无数表格，婚姻栏里一直没有填上这件事。他跟张桂芳结婚的时候，张桂芳哪里知道底细。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，他的家乡解放了。那时他家里不断给他来信，这件事再也瞒不过了。张桂芳向他提出抗议，组织上也找他谈了话，他这才回家办了离婚手续，这件事算是过去了。可是，今年四月，罗纯良正忙于镇反工作，他那离了婚的老婆突然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——若琴，带到北京来寻找父亲，偏是张桂芳又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女儿。这就是张桂芳所以要跟他吵闹的原因。

乡下老婆跟大女儿来得突然，事前既未征得罗纯良的同意，亦未通知他，罗纯良本极不乐，可是转念想来，女儿毕竟是自己生的，做母亲的也不是罪人，这是封建制度的问题。既然来了，少不得要为她们安排一下住宿饮食等问题；要为女儿找一个学习的机会。

偏是这些方面张桂芳不能谅解。她就是敞着嗓子对着罗纯良叫：

“你什么事都瞒着我？不是你叫她们来，她们自己会来？还不是你同意她们来的。你这算什么？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说你不知道她们来？好吧，就算你不知道吧。那，你应该叫她立刻回去。你把她留在这里，住在这里，还去看她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我看不惯这种事。——女儿是你的，你应该叫女儿住到这里来，叫‘她’马上走！”

逢到这样的局面，罗纯良总是低头不语。岂知愈是罗纯良没有反应，张桂芳就愈生气。

“你昨天还叫管理员带她们去逛公园，你当我不知道？”张桂芳是行政科的副科长，管理员是她领导的，这类消息如何能瞒得过她呢。“你这是做给我看的？你明天就叫她走，非走不可。你不叫她走的话，我给你闹到办公室去。”

罗纯良听得张桂芳翻来覆去总是这几句，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想制止她：

“你可以生气。可是你的声音稍为轻一点好不好？这是晚上，后院的人听了不象话。”

“什么不象话？我没有什么不象话，你才不象话呢！是你做了不象话的事，我才不象话的。——哼，是你害我的，你说你叫我怎么办？”张桂芳这几句话特别响亮，等她说到“你害我的”四字，一阵心酸，仿佛无比的委屈。这以后许多话都埋没在她的眼泪鼻涕之中了。

这情形一直维持了一个多星期。那一天，罗纯良忙完镇反运动未回家吃饭。北京的天气到了五月中旬已经入夏了。他那大女儿身上穿着一件农村常见的旧式夹袄，做父亲的看了实在过意不去，觉得女儿长到这么大，自己未曾抚养过，也未担过心思，不免有些歉意。他就带着女儿到东安市场给她买了一套制服，顺便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餐饭，并且还把她送回宿舍。等他回得家来已经九点多了，他那老丈母跟陈保姆带着小四和小小已经在东屋里睡下。张桂芳正给五岁的小三洗脚。她听得罗纯良进门，就骂小三道：

“死东西，赶快洗，洗完了去睡觉！”

罗纯良进得门来也不言语，叹了口气倒在那只破沙发上。

“爸爸。”正在洗脚的小三叫他。“爸爸，你脸上是什么？”

不，不是这边脸上，是那边脸上。”

罗纯良左脸上留着一颗米粒，孩子眼快，爸爸一进门他就注意到了。

“爸爸，你喝酒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罗纯良进门以后，张桂芳只顾给孩子洗脚不曾抬过头。她是看着罗纯良脚上那双布鞋从她身旁擦过，才开始骂人的。这时听孩子说爸爸喝了酒，她也回过头来对罗纯良斜了一眼。果见罗纯良的脸色白里泛青，一看就是喝了酒的，似乎还喝得不少。她暂不言语，拿起洗脚盆到门外哗啦一下把水泼在院子里，接着砰的一声把洗脚盆扔在地下，又是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她带着孩子进里屋去了。

“进去！”她边走边骂孩子。“这么晚还想死在外头？”

罗纯良看着张桂芳的背影苦笑着。他点了支烟，坐在写字台旁本想阅读些文件的，只因连日烦扰，又喝了两盅酒，不觉有些困意。他估量着今晚上一定还有一场吵闹，就把文件推开，顺手抓一张报过来，既不看社论，也不看消息，想看一看分类广告上有没有租售房屋的。局里人多屋少，租屋买房一直是秘书长的一件大事。

不一会，张桂芳从里屋出来了。她打横坐在写字台旁，把一条胳膊搭在桌上，开口道：

“我问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罗纯良转过脸来，透过眼镜望了她一眼。他想捉摸一下张桂芳的气势究竟有多大。只见张桂芳的嘴唇翘得高高的，她的鼻子显得更短了。

“我有事出去了。”罗纯良随口应着。

“有事？”张桂芳白了他一眼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人生在世，总会有点事的。”哗啦一声，罗纯良把报纸翻了一个身。

“你有事还把若琴带着？”

罗纯良一怔，心里想：这消息怎么这么快？

“我看若琴身上还穿着夹袄，带她去买了一件制服。”按罗纯良的设想，在他这句话的后面，少不得会引出张桂芳这样一些话来：

“你给她买制服？哼，你哪一天给我买过一件制服？家里是五个孩子，你还是给他们买过一双鞋呢，还是给他们买过一双袜？……”

不知怎的，张桂芳并没有按罗纯良的设想说话，她是这么说的：

“还带她去吃了饭？”

罗纯良唔了一下，他提防着张桂芳会说出一套节约的话来，岂知张桂芳说的却是另一番话：

“我今天本想把若琴找到家里来吃饭的，我还给她弄了一点菜，——你看我干什么？你把我当后娘？我说她妈已经走了，她一个人住在宿舍里算什么，还是叫她住到家里来吧。——你笑什么，有什么好笑的！我不会亏待她的，我告诉你。”

罗纯良听张桂芳如此说，知道张桂芳的火候已经过去。他打了个呵欠，话语就含含混混的夹在呵欠里：

“就让她住在宿舍里吧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？”张桂芳给罗纯良倒了一杯茶。“明天人家要对我提意见的。”

“她过几天就要进学校，就让她住在那里吧。那里有的是女同志，可以跟她谈谈。她自己也不愿意住到这里来，拘拘束束的……”

“有什么可拘束的？”张桂芳说。

“不，不是对你拘束，对我也拘束。”罗纯良又是一个呵欠。“这有什么法子呢，她从小不跟我在一起。——好吧，睡觉吧，我累得很。”

张桂芳熄了灯，跟着罗纯良往里屋走：

“你当然累罗，还亲自把人家送上火车。”

住在后院的三户人家，以副局长吴克勤为中心，往来甚密，无形中与前院的罗纯良自有一层隔膜。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，主要的还有一层人事上的关系。张建跟吴克勤是在延安相识的，以后在东北的时候又曾一起工作过，算是老关系。吴克勤是个乐天派，公余之暇，爱说个笑话。张建在这些方面很欣赏吴克勤的为人，总觉吴克勤有风趣，心胸开阔，是一个有修养的人。本来，人与人相处是极其微妙的。有时两个人共事，可以因为第一个印象不合式，造成双方长期的隔阂。张建跟罗纯良就是如此。终因双方的作风不同，不知怎的，这两个人一开头的关系就没有搞好，以后在一起工作总是格格不入。

那一天晚上，为了丁培基跟韩光祖两位工程师建议要到陕北去视察，吴克勤就把他们两人以及建筑工程师田钧邀到家里商量问题，在座的有张建和王仲廉。只因吴克勤喜欢热

闹，还把前院的罗纯良也请了来。大家饮茶，吃糖果，谈话。

丁培基老先生是局里的地质总工程师，据说是全国有数的人材，今天的谈话似乎主要的是听他的。他的意见，到陕北去考察的目的不在延长，他认为延长矿是浅部地层出油，主要的应该在延长的外围，了解深部地层的储油构造。谈来津津有味，仿佛前途远大。

吴克勤有一个特点，他总喜欢谈正经的时候穿插一些闲天，先是丁培基谈到古书上的记载，说是战国时代陕北的老百姓已用黑油点灯，这所谓黑油就是原油。于是从战国时代的老百姓联系到了延长职工的生活，接着你一句，我一句就提到了陕北的窑洞。不知怎么一来，吴克勤谈到了京剧《武家坡》，说是王宝钏所住的寒窑，实际上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南方的砖瓦窑，而是西北的土窑。这样一来，一个大转弯，整个话题就集中在王宝钏身上了。丁培基就说王宝钏这个故事出在山西，似乎确有王宝钏其人，她丈夫从军十几年杳无音讯，有一个农民天天瞒着她给她送饭食，后来王宝钏就嫁给那个农民了。

接着吴克勤就大谈起程砚秋来。这是去年的事，程砚秋在北京公演了三出戏，他跟张建两个连看三场，还硬逼着他爱人罗兰也去看了一场。罗纯良、王仲廉两个从不看京戏，也叫他们鼓动着去了一回，却是看不出好处来。

“程砚秋的全本《王宝钏》，那是真好。”吴克勤的兴趣一转到程砚秋，说话的嗓子特别响亮。“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句话，只有从程腔里才能找到。他的低音细若游丝，欲断还连，你以为他没有了，他又转成高音，到了这时候，不由你不叫

出一个好字来。”

从此聊天的主题就转到了程砚秋身上，吴克勤滔滔不绝地一再描摹程砚秋的艺术。这里有人听得津津有味，觉得这位局长很有艺术欣赏能力；也有人在揣摩吴克勤的为人，觉得他言语夸张，暗中好笑；罗纯良只觉得吴克勤无聊，他想站起来告退，却叫吴克勤挡住了：

“怎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情了，我想回去还有点事要办一下。”罗纯良说。

吴克勤一把将他拉住，不让他走：

“你这位老哥，专门扫兴。不走，不走，坐坐谈谈。”

这里，不少人都留他，罗纯良只得皱着眉头重新坐下。

“列宁说的不懂得休息的人是不会工作的。——你对于程砚秋不感兴趣？”吴克勤问他。

“他胖也胖得可以了。”罗纯良勉强说了一句。

吴克勤反驳道：

“你们看戏就知道看色。欣赏艺术是件高雅的事情，戴着庸俗的眼镜还能欣赏什么艺术呢。”

罗纯良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高兴。王仲廉忙插嘴道：

“程砚秋胖是胖，不过他出场五分钟以后，谁也不觉得他胖了。”

田钧频频点头，原来他也是程迷，据他的意见，他喜欢程砚秋过于梅兰芳。机械工程师梁国栋还证明田钧会拉京胡，而且拉的也是程腔。

“我这个是不成体统的。”田钧申辩着。

这一下更投吴克勤所好，他又描写程砚秋了：

“程砚秋不仅唱做俱佳，尤其是他所表现的那种古美人是有崇高的品格的，这就是艺术的格调。我们所谓艺术中的神品，就是指这种格调而言。你看他演的王宝钏，王宝钏在他的刻画下变成多么优美的典型……”

吴克勤说到这里，罗纯良插进来反驳道：

“你说的那个美人，实际上已经是徐娘了。薛平贵出外十八年，等他回来王宝钏至少是四十来岁，已经老了。”

“哈，你就是不懂艺术。艺术上的美人跟脸上的皱纹有什么关系呢。”

张建插进来对罗纯良说道：

“老罗，你的那个王宝钏最近怎么样了？大概是你的那位代战公主太凶猛了一点，使得你这个薛平贵有些为难吧？”

有人知道罗纯良跟乡下老婆的关系，都哈哈地笑了，吴克勤笑声最高。

正在这时，吴克勤的老婆罗兰匆匆进来，她一进门看见一屋子的人，喔唷了一声，就伸出两个指头来向吴克勤要钱，说是三轮车在外面等着。

“您早。”吴克勤一面跟罗兰打趣，一面从口袋里掏钱，却是没有钱。

罗兰急着要找保姆，张建掏出两毛钱来，她就叫保姆去付了车费，一面跟众人招呼，要女儿吴兰去睡觉，一面嚷着还没有吃饭，就到隔壁小屋里去找饭吃。这时已经十点钟了。

“罗兰同志真忙，我看她经常很晚回家。”丁培基老先生跟吴克勤说。